

嘉定文化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编

三秦出版社

嘉定文化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编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12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嘉定学联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5.02 360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80546—283—6/G·40 定价：6.50元

目 录

- 代 序 李宝林 (1)
- 嘉定县历史地理沿革考辨 张全明 (4)
- 疁城考 吴 义 (14)
- 宋元时期嘉定社会经济的发展 周生春 (21)
- 嘉定县社会经济及其变迁 (1368—1949) 樊树志 (30)
- “嘉定白蒜”种植史初考 严 肃 (54)
- 嘉定经学述论 顾吉辰 (59)
- 嘉定古代女子著作考 吴以宁 (68)
- 明末嘉定天主教开教考述 康志杰 (84)
- 明清之际嘉定医学的特点 来可泓 (93)
- 清末的嘉定教育 乔宗传 (100)
- 读《嘉定县续志》札记
- 归有光文学观初探 李家骧 (105)
- 归有光与史学 朱仲玉 (116)
- 归有光水利思想初探 郑铁巨 董恩林 (128)
- 从归有光的文章看归有光 刘 琰 (140)
- 评严衍《通鉴补》 崔曙庭 (153)
- 朱右曾《诗地理征》卮言 朱杰人 (169)
- 王鸣盛对前代正史的评论 刘连凯 (174)
- 王鸣盛史学的实证特征及其价值观 张新民 (186)
- 王鸣盛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 王培华 (202)
- 试论王鸣盛的目录学 顾志华 (216)

论《十七史商榷》的史学价值	邹贤俊	(224)
略论《十七史商榷》中的“论”	林文铸	(239)
从《十七史商榷》看王鸣盛的历史地理考证	陈庆江	(250)
王鸣盛对沿革地理学的贡献	贡久谅	(260)
王鸣盛对南北朝史的校勘	张承宗	(269)
《十七史商榷》纠误	单远慕	(276)

钱大昕在史学上的重要贡献	陈协渠 刘益安	(285)
钱大昕对历史学的贡献	华世锐	(292)
钱大昕史学思想钩沉	谢贵安	(304)
钱大昕的文献学成就	姚伟钧	(318)
钱大昕的目录学研究	周少川	(328)
钱大昕的避讳学浅说	邓瑞金	(339)

融各家之长 立一家之言

——钱大昕方志学说初探	倪所安	(347)
略述钱大昕方志学理论	周梦江	(354)
钱大昕考订《宋史》的卓越成绩	王瑞明	(362)
钱大昕《元史考异》刍议	修晓波	(386)
《廿二史考异》与《宋史》对勘举例	吴绍烈	(397)
钱氏兄弟与《说文解字》	阎崇东	(403)
钱大昕对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的影响	吕友仁	(414)
俗语词研究的精心之作		

——钱大昕《恒言录》简评	陈蔚松	(425)
评《潜研堂诗》	陈慧星	(431)
论《嘉定屠城纪略》作者的史德与史识	吕锡重	(437)
“靖难之变”与嘉定朱练两姓	吴义	(444)
《蛾术编》与《十驾斋养新录》	王义耀	(448)

儒者之勇，可师百世

- 论抗清志士黄淳耀…………姚载熙（460）
侯岐曾与《明侯文节先生日记》……………黄慧珍（467）
反击外来武装干涉的史诗

——太平军三进嘉定述评…………邹身城（476）

• 后记 •

代序

嘉定县县长 李宝林

我代表嘉定县人民政府、嘉定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向不辞辛劳、莅临嘉定参加庆祝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十周年暨嘉定文化学术讨论会的专家、学者，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同时为本届年会的顺利举行，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本县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前沿，上海西北的近郊。全县东西阔约20公里，南北长约25公里，总面积484平方公里。有16个乡4个镇，14.51万户，50.56万人口，其中城镇4.14万户，10.03万人。耕地45.19万亩。

本县自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建县，迄今已有770余年历史。进入明代以后，嘉定经济、文化日益繁荣，人才辈出。宋、明、清三朝，本县中式进士171人，其中一甲一名三人，另有武进士20人。明清两朝的诸生，有案可查的有6000多人。旧志收录的历代著作4,700多部。见诸史籍的经史、文学、艺术名人500余人。晚明时期的归有光、娄坚、唐时升、李流芳、程嘉燧；清乾嘉时期的钱大昕、王鸣盛等均是全国著名的学者。朱鹤首创的嘉定派竹刻，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嘉定人民富有革命斗争精神。在抗倭、抗清、小刀会起义、太平军东征，以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五抗（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粮）斗争中，涌现了众多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志士仁人。侯峒曾、黄淳耀、黄渊耀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嘉定的教育事业比较发达。民国时期曾有“无嘉不成教”之称。民国十七年，嘉定率先推行中心校区制。江苏、上海许多著名的学校中，由嘉定人主持或执教的为数不少。解放后，全县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据1988年不完全的

统计，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获高级职称的嘉定籍人士约有300余人。去年，我县被评为全国教育先进县，今年又列为全国教育改革的实验县。

明清时期，嘉定经济以种植棉花、生产土布为主。“邑之民业，首籍棉布”，“妇女昼夜纺织，公私诸费皆赖之”。所产棉布“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可谓盛极一时。但自上海开埠以后，土布业一落千丈，经济结构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毛巾业、黄草编织业兴起，粮食和大蒜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嗣后随着沪宁铁路、锡沪公路、沪宜公路的建成，闸北电力线路的架通，现代工业开始出现。

解放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嘉定县经济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1949年，全县工农业产值7,698万元，其中种植业占35.5%，林牧副渔占15.8%，工业占48.7%。至1979年，全县工农业产值（按1970年不比价计算）达7.77亿元，其中种植业占24.3%，林牧副渔占8.5%，工业占75.7%。1988年（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6.08亿元，其中种植业占7%，林牧副渔占2.7%，工业占90.3%。1988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45.78倍。1949—1980年，工农业产值年递增率为7.5%，1980年—1988年，年递增率达18.6%。1989年，我们面临着资金、原材料严重不足的严峻局面，但全年工农业总产值预计仍可达42亿元，比1988年增加16.7%。1988年县级地方财政收入3.37亿元，在全国所有县中名列第三。今年预计可突破4亿元。

经济不断发展，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亦不断改善。1988年，全县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2,00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95元。而全县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59.3%，若按劳动力计算，农民与职工收入基本相近，但农民日常生活费用支出大大低于职工，其富裕程度可想而知。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嘉定召开以研讨嘉定文化学术为主题

的研讨会，这是难能可贵的。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经济繁荣，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是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积极吸收我国历史文化和外国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坚决摒弃一切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糟粕和精神垃圾”。并强调“当前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这次研讨会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继承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整理、考订嘉定的历史文献，促进嘉定两个文明建设为宗旨，这是完全符合江泽民同志讲话精神的。

全国有20个省市、自治区的大专院校、研究机关、出版社的100多位博览群籍、腹笥宏富的专家、学者欢聚嘉定，切磋研讨嘉定文化学术的渊源和发展，发掘、整理和考订嘉定历史文献，这在嘉定历史上是一次空前的盛举。它将作为一件大事而载入嘉定史册。各位提交这次研讨会的巨著宏论，是我们进行热爱嘉定、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全县人民将从中更深入地了解嘉定的过去和现在，从而更豪迈地去创造嘉定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们正在编纂的嘉定新县志，因此也可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总之，各位辛勤的劳动成果，将会在嘉定今后的两个文明建设中熠熠生辉。

这次研讨会，对嘉定文化学术的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今后能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下去，使嘉定文化学术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1989年10月21日在庆祝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十周年暨嘉定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嘉定县历史地理沿革考辨

张全明

嘉定县，在今上海市西北境，位于长江下游南岸三角洲冲积平原的中段，地当东经一百二十一度，北纬三十一度与三十二度之间。全县东西宽约20公里，南北长约25公里，总面积483.75平方公里。东靠上海市区，南临青浦，西接江苏昆山，北濒太仓，为上海市辖县。嘉定不仅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而且还有悠久的历史。然而，时至今日，嘉定建治前的地属和建县的时间都还存在不同的意见。鉴于目前正在编写嘉定县志，为了不贻误读者，故对嘉定建治前的隶属关系与建县时间作些简略的考辨。

一、建治前地属考辨

据建国以来嘉定地区的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古代嘉定大部分地区的社会发展史可远溯至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今嘉定西北的娄塘、经县城至东南的南翔镇一线的冈身以西，已发掘各种印纹陶及新石器等，可见，当时这里已有原始先民居住，从事渔猎和农耕，并能制造一些简陋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形成了早期聚落。

据文献记载，在我国疆土传说划分为“九州”的时期，嘉定一带地属古扬州的范围。商至周初，嘉定地区多为东夷、越族先民居住，直至西周前期，在隶属关系上仍为传说中的扬州地区，分别为商的方国或西周的诸侯国。春秋时，嘉定一带多属于吴国的范围。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后，嘉定一带转隶于越国。从公元前334年（一说前355年）楚灭越后，嘉定一带则属于楚春申君的封地。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嘉定的外冈就曾发现许多战国时期的墓葬。至此，嘉定一带的隶属关系是清楚的。

从“秦并天下，置郡县，于吴越故地置会稽郡”①前后起，

嘉定一带地属疁县还是娄县，则历来文献记载不一，其歧异抵牾，影响至今。

一种意见认为：秦时，嘉定一带属疁县，汉改为娄县。其主要根据是：陆广微《吴地记》说：“长洲县东二百里有秦时古疁县。”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载：“娄县，……秦谓之疁，汉谓之娄”。明嘉靖《昆山志·沿革》篇也载：“昆山在苏州府治东七十里，《禹贡》扬州之域，周为吴，秦始置疁县，隶会稽郡，旧有疁城乡，疑即县治，今属嘉定。”谯枢铭在《上海地区疆域沿革考》中认为：秦“时会稽领县二十四，其中应有疁、由拳、海盐”三县。②在《上海的历史沿革和地理概貌》一文中也认为：“秦代，上海地区属于会稽郡疁县，地处疁县的南境。”并指出：“公元前207年，汉灭秦后，将疁县改称娄县。”③刘大松等在《上海市各县的沿革及名称由来》一文中也说：嘉定，“秦为疁县地，汉为娄县地。”④甚至今年出版的《上海辞典》在“娄县”条也载：“秦统一六国后，于今江苏昆山东北置疁县，汉改娄县”。⑤可见，自宋、明、清直至现在，许多有关上海嘉定一带的方志及其论著，在叙述其地理沿革时，多承袭此说；并且把今江苏昆山原娄城与嘉定之疁城混而为一。事实上，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秦时从未设置疁县，嘉定一带秦汉时均应隶于娄县。我认为：这种意见有一定说服力，符合历史实际。其主要根据是：第一，在秦汉几百年的史料文献中，现未发现任何有关设置疁县的记载，而宋以后有关疁县的记载不是以讹传讹，也系猜测之词。如细查《史记》《汉书·地理志》与《后汉书·郡国志》都没有提到过秦有疁县。相反，在《汉书·地理志》中只载有：“会稽郡，秦置，县二十六。”其中无疁有娄。并注释娄县条说：“有南武城，阖闾所起以候越。莽曰娄治。”⑥《后汉书》《郡国四》也载：吴郡（顺帝分会稽置），“有海盐、…娄”等

共十三县。一般来说，历史上史志中对同一史实的不同记载，理应根据最早的历史记载来进行具体的考察。娄县最早见于两汉地理志中，因秦统一王朝存在时间较短，汉又多承秦制，《汉志》所载郡县名，大多为秦所建命名，若为汉代改建或新建，都加注说明。如会稽郡毗陵，颜师古在其下加注曰：“旧延陵，汉改之。”娄县下也注有“莽曰娄治”，说明娄县在王莽时名娄治，但也没有秦疁县或旧疁县及汉改娄县的记载。故不能以后人的传说，来否定两汉地理志的记载。

第二，自秦汉至唐的史志中，从未有所谓秦置疁县、汉改娄县的记载。两汉史志已如前述，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也载：“昆山县，本秦、汉娄县。其城吴子寿孟所筑。梁分置信义县，又分信义置昆山县，因县有昆山，故取名焉。”很明显，嘉定沿革是从秦、汉娄县分置而来。

另外，即使是五代以后的方志中，也有许多人否认嘉定一带为秦疁县、汉改娄县的观点。《中吴纪闻》载：“昆山，乃古娄县，或云在汉为疁，后避钱王讳改今名。予考之同志，张昭封娄侯，则县之为娄旧矣。”宋范成大《吴郡志》也载：“秦始置娄县，属会稽郡。或谓秦名疁县，后避钱镠讳改娄县，或云改于王莽时，皆非也。今两汉志俱作娄，王莽特增治字耳。”不仅宋人指出了当时嘉定一带秦属疁县说法的错误，而且到明时，久居嘉定的著名文学家归有光还在《娄曲新居记》中指出了导致这种错误的原因。他说：“《娄县，王莽曰娄治，吴有娄侯，而或谓之疁城。江入海口为刘家港，‘疁’与‘刘’声近讹”。^⑦因嘉定刘家港，即古娄江，故有此讹误。《姑苏志》也载：“嘉定县，本昆山之疁城乡，娄，疁音相近而误。”清《苏州府建置沿革考》也认为：“嘉定县，秦、汉、东汉、三国、晋、南北朝宋齐，皆娄县地。梁隋唐五代皆昆山地，名疁城乡”^⑧《昆新两县续修合志》也说：“昆新于古为娄邑，属于吴，春秋时统于越，秦并天

下置郡县，以吴属会稽郡，仍治吴，领县二十六，娄其一也”。光绪《嘉定县志》也采嘉定地区秦属会稽郡之娄县的记载。

此外，据今考古发掘情况来看，传说中的疁城一带根本不可能在秦汉时存在建立县治的条件。这是因为，今嘉定县大部分地区虽成陆较早，但襟江滨海的疁城（今娄塘）由于秦汉时瀚海塘未筑，咸潮经常浸灌于此，因而不仅是从商周到秦汉时这里是杂草丛生的荒滩地带，而且自秦汉至唐时这片土地也仍未得到很好的开发，所以至今未能在嘉定娄塘、南翔一线的冈身以外地带发现唐以前的遗址和文物。据谭其骧先生考证：上海嘉定一带在宋嘉定年间（公元1208—1224年）嘉定置县以前，从秦汉至北宋的四个县治全在冈身以内，嘉定建县时，设治地点才向东北推进到了冈身地带。^⑨可见，嘉定一带在唐以前都没有疁县的记载，也根本不具备建立县治于疁城的条件，自然，嘉定一带秦汉时均属娄县所辖才是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

那么，历史上究竟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把娄县的前身说成疁县、把娄县治与疁城混而为一的呢？

其原因之一是：唐时在昆山东境（今嘉定娄塘一带）设有疁城乡，宋时又曾在此掘得唐疁城乡庄府君墓铭，^⑩所以宋建县时，人们头脑中早已有先入为主的“嘉定，本古之疁城”的概念，然而人们又知道，嘉定一带建县前为昆山所辖，而昆山又为信义所分置，而信义又为娄县所分置，这是无庸置疑的，为了以“疁”字来显示嘉定县历史的悠远，所以有人误以为娄县之前应有一个疁县。有人以为秦改疁为娄，而又有人以为是在汉改疁为娄，纯属臆测，查无根据。

原因之一是：嘉定历史上的确有个疁城地名，由于元会稽人杨维桢在为《练川志》所序时，将嘉定县与疁城联系在一起，因此，有人推测嘉定县境内疁城之地名肯定就是秦汉疁县的县治所在地。殊不知，秦汉时根本未设疁县，疁城一带在当时也根本不

具备作为县治的条件。其实，疁城在唐时只是一个乡地名而已，它同当时在今嘉定境内所设临江、平乐乡名一样普通，并非包含有此地历史上存在一个县治城邑的特殊意义。另外，只是五代时期，因为疁城名犯吴越王钱鏗之讳，故改名娄塘，而旧志编者无视《汉志》已有娄县，以为娄县也即疁县所改，所以造成了误会：以为娄县之前身为疁县，前疁、娄县治即疁城。按谭其骧先生考证：秦汉娄县治同今江苏昆山县治，而疁城（今名娄塘）在今上海嘉定西北约六公里处。^⑪《辞海·历史地理》也载：娄县，秦置，治所在今江苏昆山东北。其中，并无疁县词目。只是在“疁城”条中载：“疁城，上海市嘉定县的别称。因隋唐时为昆山縣疁城乡而得名。又或别称疁塘。”根据文献与考古资料考查，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嘉定一带秦属娄县，并无疁县；疁城亦非娄县县治，更不是无中生有的疁县“设置”的根据。

至此，或许有人要问，嘉定既非古疁县地，那又为什么在今嘉定有许许多多与“疁”相联系的地名、厂名、校名、店名呢？这是因为自宋至元，特别是清，由于人们误把嘉定与疁县联系在一起，加上有个疁城，人们为了显示其历史的悠久与古老的文明，“疁城”作为嘉定县的别称或代称遂约定俗成，相沿至今，因此，疁东、疁西、疁南、疁北、疁报、疁城镇（1946—1949年，嘉定县城曾用此名）等名称应运而生。事实上，今之嘉定县城，实为宋设县时之练祁市，根本不是古疁城；而疁城只是与今嘉定所辖之娄塘镇有关。然而，作为约定俗成的语言，传播媒介的工具，人们不可能，也无必要去探索其历史上存在的实际情况，疁城作为嘉定的别称，在近现代已经流传开来，并可能继续流传下去。但是，史实不可不辨。

二、建县时间考辨

嘉定建县的时间，根据各种文献记载，已公认是南宋嘉定年

间。但是，究竟在嘉定哪一年置县，却有四种意见：

其一，嘉定十五年建县说。

据《宋史·地理志》载：“平江府，…嘉定。上，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析昆山县置，以年为名。”宋按县的户数多少分为七等，这是说嘉定属于第五等，即上县。是嘉定十五年分昆山县东境吴淞旧江为界，以其北置嘉定县，其县名因年代命名。《昆新两县续修合志》也载：“宁宗嘉定十五年，太守赵彥肅、提刑王棐，奏割昆山境东南安亭、春申、平乐、醋塘、临江五乡为嘉定县。”

其二，嘉定十二年建县说。

《嘉定报》编辑部在《嘉定城乡古今谈》一文中认为：“据历史文献记载，嘉定在隋唐五代时属于吴郡（苏州府）的昆山县，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从昆山分出，单独设县。”^⑫

其三，嘉定十一年建县说。

按《古今图书集成》《苏州府建置沿革考》之二载：嘉定县，“宋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县始创”。

其四，嘉定十年建县说。

据光绪《嘉定县志》记载：“嘉定旧为吴郡属邑，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析昆山东五乡，因年以纪名，即练祁镇以为治。建县之初，南襟淞浦，北带娄江，东抵大海。”其政区范围即今上海地区吴淞江以北，上海市区以南之黄浦江以东至海的广大地区，大致相当今上海宝山、嘉定等县地。《嘉定县续志》也载：“宋宁宗嘉定十年，建县之初，领五乡二十七都。”近几十年以来，在各种有关上海或嘉定沿革的词条、论著和文章中，大多沿袭此说。刚出版的《上海辞典》嘉定县条也载：“嘉定县，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置县，故名。”此说差不多已成为一种定论。

根据嘉定建县的具体过程来考察，以上一、二、四说大多

有欠妥之处。事实上，按嘉定建县的经过来看：嘉定七年（1214年）为建县的酝酿、构想时间，嘉定十年是奏请准备建县的时间，嘉定十一年是正式批准建县的时间，嘉定十二年是实际建造县城的时间，嘉定十五年是嘉定县完全建成独立、脱离与昆山县城相联系的时间。

据《宋史·赵彥肅传》和各种《嘉定县志》以及与嘉定相联系的《昆山县志》与《宝山县志》记载：早在嘉定七年，平江府就开始酝酿、构想建立新县，于是当年就奏请朝廷划分出昆山县城东境五乡“欲于练祁市添置一县”。后平江府接到尚书省批文，认为建县经费巨大，要求复核。因此，平江府接到批文后，即委托本府僚属长洲县娄主簿和吴县邱丞相进行实地考察，权衡利弊。通过考察，娄、吴认为：应该新置一县。但因同样鉴于建县费用过大，故提出先添置一县尉以应急需；然后逐步建立县制，从根本上解决昆山县城东境（即要求新建县地）治安恶化、赋税难收等棘手的问题。可见，嘉定建县经过了较长的酝酿、构想时间。

嘉定十年九月，平江知府赵彥肅、浙西提刑王棐上奏，要求“割安亭、春申、临江、平乐、醋塘五乡别为一县，建治练祁市，以嘉定为名。其张官置吏事件并照绍兴府新昌县、处州庆元县创置体例，参酌续次，白请施行。如蒙俞允，郡县幸甚。”^⑬同年十二月九日奉宁宗旨令浙西提刑司、平江府会议具体建县的准备事项上报，其中包括推举知县、拟组县衙机构，筹措建置费用等。经过这些准备，时间至少已是嘉定十一年，所以说嘉定十年是奏请准备建县的时间。可见，把嘉定设县的时间定在嘉定十年显然是欠妥当的。其主要原因是浙西提刑司与平江府两署不可能在接到圣旨，当年仅剩二十一天的时间内完成组建新县的任务；另外，退一步讲，即使两署办事效率很高，能在短期内完成组建新县的准备，但需再次上报、等待朝廷正式审批，在短短的一二

十天时间内公文旅行往返无论如何是来不及的。或许正因为如此，许多记载嘉定建县的文献不尽一致而互有出入，看来是事出有因。

嘉定十一年，浙西提刑司与平江府按皇帝旨意在完成组建新县的任务并上奏以后，得到了皇帝正式批准建县的诏令。宁宗恩准以平江府知府推荐的任期刚满的原昆山县知县高衍孙为首任知县。新置县名也以当时皇帝的年号命名，其它有关建县事项亦按平江府所奏施行。同年五月，知县高衍孙到任理政视事，并先后任命陈采为县丞，赵汝备为主簿。同时着手建立县署机构、营造社稷坛等。至此，嘉定县才正式建立。

嘉定十二年，知县高衍孙以嘉定县境前两年的田租税赋作为营建县城公署的费用，其中主要修筑了县城土城墙和县学庙堂等。今仍存城南大街的嘉定孔庙虽历经多次扩建与整修，最初“文宣王庙”就是嘉定十二年修建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唐宋明清时期设置新县时，一般即按惯例兴建孔庙，加上经多次扩建的嘉定孔庙为江南各县文庙中建筑规模较大者，人们多熟知其修建年代，所以《嘉定报》编辑在1958年为《解放日报》撰文时即以修建文庙的年代为设县的年代，然不知这种推测的时间恰好是靠不住的。因此，遍查有关嘉定建县的史志，即知嘉定十二年建县说完全系臆测之词。

嘉定十五年建县说，虽有《宋史·地理志》和《昆新两县续修合志》作为根据，但也是靠不住的。《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尽管有“嘉定十五年”之说，但很显然，系衍字而误。据其志卷一沿革表载：“宁宗嘉定十五年，太守赵彦橚、提刑王棐奏割昆山境东南安亭、春申、平乐、醋塘、临江五乡为嘉定县。”这段文字经查，系光緒年间续修志者转抄乾隆年间所修《昆山新阳合志》沿革表添增“五”字而误。因详细对照两志之沿革表除一个为“嘉定十年”，后一个为“嘉定十五年”外，其它则无不同。

此外，就是《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在卷八《市镇》篇也载：“至宋嘉定十年，复分安亭、春申、平乐、醋塘、临江五乡，凡六保为嘉定县邑。”不言而喻，《昆新两县续修合志》的自相矛盾和抄写前志的衍字是再清楚不过了。

那么，《宋史·地理志》作为比较权威的记载为什么又未被明清时期修志者所采用呢？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在修志者看来，《宋志》的这条记载，并不比建县前后赵彥肅、王秉所写《奏建嘉定县省札略》和知县高衍孙所写《创县纪略》更具有说服力，因此，后来修志者多采赵、王之说。只是在采此说时未注意文章末尾所署的时间，而只注意文前有嘉定十年字样，故又产生了新的错误。第二，是因为嘉定县系从原昆山分地而置，按照建县程序，需有关官吏上奏朝廷、然后经皇帝批准、再建立县衙、修筑县城等，完成这些手续必须有一个时间过程，少则一二年，多作三五年，实乃司空见惯之事，因而历史上人们在记载新县建置时间时，有的以上奏时间为准（如嘉定十年建县说），有的以诏令批准建置为准（如嘉定十一年建县说），有的则以完成建置为准，或许这就是《宋史·地理志》记载为“嘉定十五年建县”的根据。第三，又因为嘉定县首任知县是原昆山任期刚满的知县高衍孙，因此，这也成为文献记载建县时间不同的诱因之一。此外，还可以从《嘉定县志》与《昆新合志》的相同记载发现，由于嘉定系昆山分出新置，新旧知县又为同一人所任，故《嘉定县志》卷十四与《昆新合志》卷八同在《选举志》中都载有“嘉定十三年，庚申刘渭榜”条，其中都把黄保大载为本县进士。可见《宋志》是以嘉定新置县城制完全完成为根据的。不过，嘉定县衙署与城池虽在嘉定十五年才最后完成，但它却不能作为嘉定正式建县的标准。

综上所述，嘉定正式设县的准确年代应是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即公元1218年。